

过渡时期的德国

Germany
IN TRANSITION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代达罗斯》1994 年冬季专刊

过渡时期的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1994 · 北京

034352

Winter 1994, "Germany in Transition."

Issued as Volume 123, Number 1,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94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36 Irving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Number 12-30299.

Editorial Offices: Dædalus, Norton's Woods, 136 Irving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EO 90/31 0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授权翻译印制

前言

1993年10月的最后一天，当我读着《代达罗斯》杂志的专刊《过渡时期的德国》一书的清样时，不禁感到4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大。这不是指任何4年，当然是指自1989年10月以后的4年。1989年的初秋，柏林墙这道分界线还依然横卧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德国之间。此时，曾经被共产党欧洲内外的许多国家视为世界上第十大工业化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那种甚至与1988年也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庆祝她的40周年生日。“戈尔比，戈尔比”（对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注）的呼喊声在东柏林的大街小巷回响，欢呼着一位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并发誓要变革的苏联领袖的出现；同时在东德的主要城市也几乎每晚都要举行游行，这和人们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来在东德所看到的游行活动大不相同。

这确实是令人陶醉的时刻，而这一年的11月更是令人难忘。当柏林墙被拆除的时候，目睹这一壮观场景的几千万电视观众无不感到震惊和激动。欧洲（乃至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由于新闻记者、学者和政治家们所称的那场“冷战”而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凝冻和死寂之后，此时此刻开始了突如其来的和出乎意料的解冻；1989年

的秋天奇妙般地变成了春天。如果打开 199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时报》，对当时的记忆会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人们的脑子里。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由经验丰富的 C. 惠特尼撰写的有关当今德国的特别报道。文章的标题十分吸引人：“德国人开始意识到新纳粹抬头的危险”，惠特尼描述了如今有人在拥护曾被认为是不复存在的纳粹信条。他的文章令人感到沉重之处在于，政府和公众对纳粹分子都更加重视，认为他们“要比大多数德国人所想象的更有组织和更具有危险性”。

惠特尼写道：“在过去一年半里，反犹太人和排外的暴力活动浪潮已造成 24 人丧生，大多数袭击活动如果不是好斗的民族分子和新纳粹分子的组织所直接操纵指挥的话，也是他们所鼓动的。”他接着说：“右翼攻击者们在今年头 9 个月向外国人发起了 1480 起袭击，这是 10 年前所报道的类似事件的 22 倍。”右翼情绪的高涨部分原因是合并不久的东德所蔓延的失业现象所造成的。他还引用了一位 23 岁的年轻人在美因茨火车站外所说的话：“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了。”这位被采访者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到处都充斥着外国人。据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负责人 I. 布比斯说，1992 年有 80 处犹太人的墓地遭到亵渎，“这相当于 1926 年至 1931 年之间这几年时间内所发生的类似事件的总和。”惠特尼在引用此话时解释道，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已经意识到这些事件给德国所带来的伤害。

惠特尼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报纸撰稿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对名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新闻采访上，他的观察和看法超出了采访对象的陈述。他写道，新纳粹分子并没有形成整体，也是缺乏协调性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之间互不联系，“他们的联系渠道对他们的对手和政府当局来说是隐蔽的。”其中许多人还很年轻，才 20 来岁；有的在 65 岁左右，一辈子都是纳粹分子。新纳粹分子中有东德无业的失落青年；还有的是西方富人的孩子，他们公开背叛家庭。

其共同点是，他们都很愤怒；他们所用的词对那些了解过去纳粹的人来说都十分耳熟。但惠特尼认为，很难“在助长这种敌对情绪的领导人和从事暴力活动的年轻人（几乎都是男人）之间找到什么明显的联系”。许多新纳粹的领导人都自称他们对暴力活动并不感兴趣；年轻的有时也这么说；他们只是希望外国人离开德国。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说的：“在这种过于拥挤的和失业率很高的状况下，我们经不起他们同德国人来争这些本来就很紧张的住房和工作机会。”他的母亲是位英国人，父亲是德国人。

《纽约时报》所登载的惠特尼这篇文章完全反映了该报的观点，与此相邻的一篇是报道了金斯市长因竞选费用超支而被罚款的消息，另一篇报道了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指责克林顿总统过分铺张和他的庞大的保健开支。这家报纸十分清楚读者可能对什么感兴趣，也很清楚作为一家美国的主要报纸其读者遍布纽约以外的美国城乡。次日巴黎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则有实质性的不同，上面也登载了一篇惠特尼的文章，紧挨着的是一篇该报撰写的有关科尔在联邦议院的讲话的报道和一篇有关美国生产率提高的消息。据报道，科尔总理“责备他的公民们使德国在创造性和经济竞争方面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按该报的专职撰写人的话来说，通过全国性电视台播出的科尔的讲话是他为“唤起德国人抛弃他认为的那种自傲和有碍经济发展的陋习”所作的努力之一。科尔的讲话谈到了曾使德国为之骄傲的高科技工业的衰落，谈到人工成本过高，谈到劳动热情的消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德国工业和商业的下滑。科尔说：“如果要保证德国的未来，我们就不能把德国当作一个游乐园来治理。”他否认了德国的问题是两德统一所造成的说法，同时驳斥了需要增加公共开支的观点。科尔的注意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1994年的大选上了，他说：“重新思考一下比再重新分配钱更为重要。”他赞扬了作为德国社会“支柱”之一的“社会合作”精神，它是德国未来的保证。人们真希望如有一位经验丰富的

《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来解释一下科尔总理的讲话，来对他的话作一下评注就好了。如今的德国并不是大众媒介所通常描绘的那个国家。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捏造莫须有的危机，或者是渲染危机，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去作综合全面的报道。

本书的全新之处在于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它赋予的使命。本书要达到三个目的：对二次大战后的整个时期作一回顾，考察在此40年期间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注意到，当今的“焦虑时代”并非源于1989年——尽管此后发生了许多令人沮丧的事情，1989年仍然是惊天动地的一年——注意到去除过去的，甚至远到本世纪初的神秘色彩，是十分有益的；最后，看到当今的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确实陷入了困境，这是有社会、政治和思想根源的，当然这并不能理解成是低估了世界经济衰退的重要影响。

本书是关于德国问题，但也涉及欧洲问题、民主问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性问题——那些由富裕所导致的成就和弊病，这丝毫不是对本书未涉及者而言的。尽管作者们对德国的“危机”问题直言不讳——这类问题在许多方面还很严重，但同其它某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没有什么两样——本书却是旨在就折磨所有繁荣的民主国家的问题作更深的讨论。尽管重点强调的是德国，但所指的面更为广泛。本书提出了诸如这些问题：如果当今时代不是在发问富裕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干得如何，他们又怎样会显得那么脆弱和不成熟呢？在20世纪之末我们是否还能谈及“辩论的政体”呢？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通过电视传播的政治谈论是否会受人尊重呢？代表性的制度情况如何？更高层次的研究和曾经被乔装打扮成文明讨论的问题有何结果？为什么1992年没有发生至少像那些对布鲁塞尔如此怀有抱负的人所预想的事呢？德国对外部世界有多么了解？它的信息和理解是否明显差于那些欧洲的伙伴国家呢？德国社会是否从根本上说是临时性的呢？但又有哪个欧洲（或北

美)社会不是如此呢?是否能指望一个临时性的社会去应付得了目前困扰整个世界的紧迫问题,包括那些困扰西方富裕国家的大量问题呢?西方民主国家包括德国是否能形成一种内聚力使得它们能为保证基本人权而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同时也为公平地享有世界的丰富资源准备条件?

据认为,德国目前正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前途未卜。但这种情况并非发生在这一个国家。事实上,类似于“欧洲悲观主义”的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是如此之普遍和司空见惯,有时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过度的担忧心理无处不在,虽然可以隐约地感到希望的存在,但几乎没有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智上的疲劳因为某种很普遍的感觉而有增无减,那就是,每当我们继续创造新的政治和社会词汇,我们实际上就成了语言和那些无非是对已失去的世界的怀旧情绪的表述的囚犯。对德国所发生的暴力的关注实际上是对同一现象总的关注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只不过这种现象有时在其它主要民主国家只是以另一些形式出现而已。如今,“法制和秩序”已不仅是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的呼声,而且是政治家们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获得这些,但很清楚这是真正符合民心的。同样这也符合人们要求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愿望,这比对就业保证的呼声更为强烈。许多西欧国家包括德国的很大一部分得以居住的舒适宜人的城市和夏季四周到五周的长长的假期并不能弥补老人们的那种隔绝感和很多年轻人所经历的动乱。

德国或许是或许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人们不仅会问,这是否完全可以用来指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呢?但这是一个在竭力寻求使二次大战以后几十年来所获得的某些益处永恒化的社会,同时安抚对未来所存有的担心,虽然这种担心在国内外都有。如果说如今没有什么人在预测1994年德国的许多选举将是什么结果,那么也没有人在为2000年德国、美国、俄罗斯、欧洲乃至世界将是什么样子而下赌注。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弥

补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是德国所存在明显缺乏想象的情况。我们显然是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或60年代的世界；我们的问题所在是，我们不再对21世纪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感觉，或者对如何从目前的状况到达我们所想到达的那个境界有什么感觉。

本书描绘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德国，但这也是“另一个德国”，是美国和欧洲的大众媒介几乎尚未捕捉到的德国。本书是一面镜子，它不仅想要展示这个庞大的单一的人口群目前的状况，而且要论述这里的问题为什么不是独有的，为什么实际上只是普遍存在于繁荣世界的其它一些国家的问题的翻版。当然，它们有自己特有的模式，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是十分有益的。德国的偏见和担忧（恰恰是因为这些担忧和偏见对德国是独特的却不是独有的）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早先欧洲的（和美国的）乐观态度已经消失，为什么当代政治家的论述如此避免对那些确实很敏感的问题的明确考虑。德国的形象是复杂的，充满了阴影和细微的差别，这既不是丑陋的形象，也非带有粗暴和过分的自信。这是谨小慎微的德国形象，它正经历着对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很普遍的困难，而后者面对1989—1990年所产生的这个新世界都深感茫然失措。

在德国，道德观念的更新如今也是一个主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希特勒垮台以后的联邦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是很不相同的。价值观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人们面前，这并不是什么陈辞滥调。在德国许多地区它引起人们正当的关注，在这些问题上德国人内部难以一致。如果在昂纳克最后几年执政期间访问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西德人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对他们在那里所目睹的情况保持沉默，如果更多的人对共产党领袖访问波恩表示欢迎，并表现出恰当的热情和尊重，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全体德国人的共同利益需要这种沉默。在目前的条件下，没有任何理由不谈谈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实上一切都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

局的档案被公布于众，统一迫使原西德人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再次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沉默，这不只是指纳粹时代的沉默。

给德国人民带来沉重压力的人为的分界线把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分隔了几十年，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的和解，这就够值得重视的了。但更复杂的还在于，心理上的障碍有可能并不亚于经济上的问题，在家庭问题和性关系问题上的差异，诸如在最近的争论中提出的有关流产和失业问题等，将引起更大的和更激烈的争论。即使东德城市的街道和西德的一样明亮，即使电话火车都一样令人满意，总而言之，即使东德的基础设施与西德更加接近，这样的争论也不大可能减弱。心理上的创伤是最深的、最难以治愈的，也是最复杂的。

本书的计划是从瑞士科佩的一次会议上开始的，那里是斯塔尔夫人的故乡。我们非常感谢德奥松维尔伯爵为我们安排了这个历史名城作为会议地点。把科佩作为这本关于当代德国的论文集的起步点似乎是很合适的，因为关于早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古典著作之一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本书的作者们以后又在布拉格会面讨论文章的草稿，同样，选择这座城市也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德国作为大西洋地区和欧洲的伙伴，是本书所详细论述的主题。本书试图把德国的经历放在某种背景之中考察，这种背景考虑了20世纪末的问题和机会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之间的联系。

有许多人为完成本书尽了努力，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慷慨的帮助，使这本论文集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不回避争论，并有别于那些有关德国问题的陈辞滥调。

在此还要一并感谢那些曾在会议和编辑工作方面给予帮助的机构。在本书出版的同时，另一本正在安排于1994年出版，该书将继续这里的讨论，着重论述德国与中欧和东欧新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它在欧洲共同体和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和盟国之间的关

系。毫无疑问，作者阐述的是他们本人的观点，并非是与他们在专业上有联系的团体的观点。由于时间仓促，有些本可用英语写成的文章的作者只能送德文稿。我们已作了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以便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这些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目 录

[1]	前言
[1]	德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是通过 协商一致而实现变革吗? 迈克尔·默特斯
[31]	德国的民主 史蒂文·穆勒
[55]	处在十字路口的德国:论德国经济的效率..... 库特·J. 劳克
[81]	统一后德国的外来移民及社会安定问题 克劳斯·J. 巴达
[97]	重建一个国家:统一前后的德国人.....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115]	论德国的民族认同特性 安妮·玛里·勒·格洛奈克
[133]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 斯蒂芬·艾泽尔
[155]	统一的危机:德国如何变革..... 朱根·科克
[171]	形形色色的德国人的德国 路哲·屈恩哈特
[187]	新德国的社会诸方面问题及民族认同特性 玛丽·富布鲁克

- [207] 两场灾难,两个起因,德国人将如何对待
..... 巴托尔德·C. 维特
- [221] 新教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理查德·施罗德
- [231] 对德国政治阶层的考察 约亨·蒂斯
- [243]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遗留文件的处理 约希姆·高克
-

德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 是通过协商一致而实现变革吗？

迈克尔·默特斯

言辞与事实

德国仅仅是从法律的角度讲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还是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对于一个经过几十年分治，只是在不久前才重新统一的国家，对于它的社会与政治文化怎样写才有意义呢？鉴于它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文化，而且这种差异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如果我们在谈论问题时把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文化都考虑到，岂不是更合适吗？

当前在言辞上存在着严重混乱。然而，是仅仅在言辞方面呢，还是也包括在事实方面？例如，“新州”一词(neue Länder)的含义是指东德的5个州加上柏林的东部。为什么要称为“新州”呢？深究起来，拿东德的一个州如萨克森州与西德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相对，前者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间要比后者实际上早几百年，后者到1964年才成为一个州。说萨克森“新”只是因为它在1990年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得更精确些，只是人们把它叫做新州，因为西德人是这样看的。然而，多数东德人也使用“新州”

这个词；毫无疑问，它听起来不像“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ehemalige DDR) 那样不友好，同时比“新加入地区”(Beitrittsgebiet，西德一位匿名的官员造出的一个难听的词，虽然从法律角度看是正确的)听起来顺耳。

再举一个例子。统一之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叫做什么呢？多数人称之为“以前的国家”(die alte)；有些人称之为“前联邦共和国”(die frühere Bundesrepublik)，好像它突然消失了。还有些人喜欢用似乎属于中性的词 Westdeutschland (其含义既可以是“德国的西部地区”，如用小写的 w 的话，又可以是有政治内涵的“西德”)，而把“新”州相应地称为 Ostdeutschland (“德国的东部地区”或“东德”)。这仅仅是用词不同之争吗？

人们还可以花功夫去讨论表示 1990 年 10 月 3 日发生的事情 (指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译注)，是用“重新统一”(Wiedervereinigung)，用“统一”(Vereinigung)，还是用“结合”(Einigung，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词，词义是“协议”和“统一”的混合，另加一点“家庭团聚”的亲切味道)呢？主张用“结合”这个词的人说，这个词的德文 Einigung 来源于 1990 年 8 月 31 日《西德统一条约》的德文正式缩略名称 Einigungsvertrag。德国的新闻人员和政客大多喜欢用“结合”一词。其用意——不论是否出于自觉——是，今日的德国既不是凯泽·威廉的帝国，也不是比这讨厌的东西。所隐含的假设是，历史开始于 1949 年，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时，可以说，它建立在一张白纸上。在德国的欧洲邻国中，人们则用“重新统一”这个词。他们认为，德国(《兰登社英语语言辞典》过去的定义是“过去在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又卷土重来了。什么样的德国？你无法借助言辞逃避这一问题。

东德并入西德

那么,德国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最坦率的回答是相当于把它称为“第四帝国”：“我认为德国人从总体上说不正常。我想他们的基因有问题,虽然我对基因没有研究。”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总体上”;这里又提出了关于“民族性格”这一永久神话。第二种回答是,统一后的德国仍是原来的联邦共和国(现在有些人喜欢称之为“波恩共和国”),只是因为增加了5个“新州”,版图扩大了。持后一种看法的人认为,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难道这种看法不是根本错误的吗?

德国是通过“新州”加入联邦共和国而重新统一的。这意味着,德国东部立即采用了西部的宪法和政治、法律及经济制度,虽然在某些次要的方面有所例外。1990年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的选举为这一步骤提供了民主的合法依据。在竞选运动中,占压倒多数的选民,即75%的选民投票支持坚决主张通过加入西德实现国家统一的政党。与此对立的主张有两种:一种是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另一种是制定一部东德和西德都能接受的新宪法,以这部新宪法为基础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竞选中这两种模式都遭到选民的摒弃。这两种选择程度不同地反映了“第三条道路”思想,即主张在面对着“兰博式”美国和当时苏俄的情况下,德国走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中立的“另一条道路”(Sonderweg)。

波恩共和国理论——即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只不过是版图扩大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理论——还有另一个非根本性的,但也不是不重要的依据,即这样一种事实:德国人口有四分之三生活在西部,西部的产值所占的比例更大。当然,从根本上说,西德的巨大优势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相对于集权专制制度

的优越性。甚至在推倒柏林墙之前，德国人共同的愿望和梦想就是单方向的：从东德到西德。从许多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700 万东德人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向现代化和西方化跋涉的崎岖之路，而在同一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远见卓识，西德人已走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坦途上。

声称代表战后德国历史的主流，这是联邦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奉行的国家概念中的一个核心要点。1949 年的《基本法》（即宪法）称，西德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开放的社会“同时也是代表了那些受阻而未能参与的德国人”。这是西德的狂妄自大？恐怕不能这样说。只是在说自由优越于压迫属于傲慢时，只有当西德人旨在炫耀自己的成绩——现在确实有许多西德人喜欢这样做——指责东德人不行时，才能这样说。

东德统治者非常清楚，联邦共和国称它代表全体德国人，这对他们的合法性构成持久的威胁。当然，原来的联邦共和国还不是一个有充分资格的国家。所以这就使那么多人不能自制地浪费精力和笔墨，企图解开（西）德国的真正的共同认同（Identität）到底是什么这个谜团。不过，对于西德的国家政体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政体这一点，没有人真正提出过怀疑。蒂莫西·加顿·阿什称之为“通情达理的、平民参与的、文明的”。东德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对民族认同感作出全面的解释。正如东德一位主要的思想理论家奥托·赖因霍尔德毫不含糊地指出的那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它代表了“代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 1989 年 8 月，当时大多数西德人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永远存在下去。

联邦共和国最大的文化成就是，西德人心情舒畅地感到自己是西方及其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是不断密切的欧洲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当前，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关系是德国政治观念的核心。主要的文化挑战是如何把这种意识深深置入东德人的心中；西德人